

国家价值链与中国经济平衡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谢莉娟 陈锦然

内容提要: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加快建设中国国家价值链具有了更突出的意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当前新发展格局下的现实要求出发,分析了加快建设国家价值链的战略必然性,并强调应重视其对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且应建立在国内外国际市场相互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第一,国家价值链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平衡地发展,并能“纠偏”全球价值链嵌入不均下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二,通过识别国家价值链建立在国内外国际市场联动基础上的“复合型”与仅限国内市场的“单一型”,本文发现“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具体通过提高欠发达地区自主发展能力、加强产业关联、推动技术升级的作用渠道来实现;第三,信息化均衡发展作为互补性条件发挥“放大镜”效应,能促进国家价值链对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正向作用。本文为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建设提供了有益思路。

关键词:国家价值链 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开放 信息化

作者简介:谢莉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2;

陈锦然(通讯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100070。

中图分类号:F72;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2)11-0140-16

一、引言

在当前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建设中国国家价值链是顺应分工深化、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经济地位提升的迫切之举和长远之策(谢莉娟等,2021)。国家价值链也称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 NVC),相较于全球价值链,其看重以本国市场的需求、技术和区际分工等为

*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项目“在新发展格局中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22XNL013)。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陈锦然电子邮箱:chenjinran@cueb.edu.cn。

基础,形成以本国企业为主导且掌握核心环节的价值链模式(崔向阳、崇燕,2014;Beverelli 等,2019)。^①近年来,对国家价值链的学术关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出于壮大国内市场、充分利用本国市场分工优势和内需潜力的现实考虑(盛斌等,2020),这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有了更突出的意义;另一方面,构建国家价值链为培育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合作新优势提供了契机,包含了更长远的国家战略思维(崔向阳、崇燕,2014)。

既有文献关注了国家价值链在推动区际经济联动发展、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的作用(邵朝对、苏丹妮,2019;谢莉娟等,2021),本文主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进一步探讨国家价值链对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其一,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平衡地发展吗?无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揭示,还是从资本全球扩张的当代现实来看,在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价值生产体系中,“资本的生产”借助国际分工扩展到世界各地,日益精细的全球价值链模式仍难以避免资本逻辑下的不平等交换,表现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两极分化。而在中国情境下,我们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地区间的价值链嵌入地位分化有着类似于全球价值链的原理,那是否会因此为经济发展注入不平衡因素呢?基于这一思考,我们不仅要关注国家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还要认识其对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其二,应进一步识别其施加影响的情境或条件。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突显出国内大市场的战略价值,同时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说明国家价值链要以融入高水平开放为前提。因此,对国家价值链的认识不应限于“本国”视野,要结合国内国际市场考察其不同构建情境或作用条件。

基于以上研究工作,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现有文献已对国家价值链的经济增长长效效应展开较丰富研究的基础上(盛斌等,2020),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依据,同时结合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实证检验国家价值链对国内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在研究角度上做了一定补充。(2)结合新发展格局的现实特征,本文在结合数据条件和参考黎峰(2018)并加以改进的基础上,根据“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与“两头在内”的不同情况,将国家价值链区分为“复合型”与“单一型”,不仅在定量测度上提供了有益补充,而且相较于持有相似观点的既有研究(崔向阳等,2018;陈启斐、巫强,2018),本文可进一步认识国家价值链的不同构建思路(“单一型”与“复合型”)所发挥的异质性作用。^②(3)本文的改进还体现于一些实证细节。对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本文以“复合型”国家价值链来反映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共生的情形,而以“单一型”国家价值链来反映从原始投入、生产过

① 本文采用的“国家价值链”概念与多数文献中“国内价值链”的概念基本一致,即反映以本国市场的要素为支撑、由本国企业掌握核心环节、基于本国市场需求的价值链类型(刘志彪、张少军,2008;黎峰,2017)。但区别于一部分文献将“国内价值链”的测度限定为布局于本国市场(沈剑飞,2018;邵朝对、苏丹妮,2019),本文结合构建以国内市场为主导,同时重视开放市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对“国家价值链”的测度不只限于本国市场的范围,还在进一步细分的“复合型”国家价值链测度中考虑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此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多用“国家价值链”的说法(丁涛,2014;崔向阳、崇燕,2014)。因此,本文在比较后使用了“国家价值链”这一术语。

② “复合型”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均是立足本国市场需求所开展的专业化分工模式,最终需求端均“在内”。二者区别在于,“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来自国际市场的原材料或中间品,生产端中存在“在外”环节,而“单一型”国家价值链生产端中的各环节则均“在内”。

程到最终使用完全布局于国内市场的价值链情形。^①同时,考虑到平衡发展并不等于经济增长的简单趋同,本文围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活保障、经济增长多维度对地区经济发展进行测度。

二、理论依据与影响机理

结合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对于支撑和巩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具有战略意义,同时,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意味着,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应以高水平开放为前提,其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目的,还要更重视国家价值链与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下文先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简要回答在新发展格局中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而结合既有文献对国家价值链与国内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进行影响机理分析。

(一)在新发展格局中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几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固然没有使用价值链这一当代概念,但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剖析,以及对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等问题的阐释,均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启示。

1. 建设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战略必然性

在新发展格局下,更突出了国内价值生产体系对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的主体作用,从深度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角度,对国内市场区际分工逐步细化至价值链层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从双循环视角来看,也是优化国际价值分配格局的必然之举。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贸易的本质批判,深刻揭示了在由资本驱动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产生“中心—外围”不平等交换的必然性。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分工仍被资本逻辑驱动并主导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难免不平等地嵌入各价值分配环节。资本逻辑使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贸易从根本上也是资本扩张的自由,为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实现进一步控制和调节生产赋予了可能,即“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②。在马克思看来,“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如同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③。“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这种差额或余额“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④。在当代资本主义所呈现的新帝国主义时期,巨型跨国公司更是利用对技术、流通等核心环节的集中控制而加剧了霸权主义和贫富分化(程恩富等,2019),不平等交换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升级(丁涛,2014;谢莉娟、王晓东,2020)。

从上述启示出发,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我们可以逐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的位置,但难以扭转原有体系的不平等依附关系,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具有战略必然性。同时,在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国家价值链更在于促进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主动有效对接,是基于大国经济地位提升的战略之选。

① 与既有研究通过区分最终需求来源类型下的增加值分布以定义价值链的方式相类似(余丽丽、彭水军,2019),本文基于本国市场需求的视角对“复合型”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做出概念界定。此外,区别于部分文献关注外需驱动下的国内区域间增加值流转特征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余丽丽、彭水军,2022),本文着重关注内需主导下的国家价值链与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事实上,推进价值链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主导的构建思路在既有研究中也有所体现(黎峰,2016;陈启斐、蔡璐,2020)。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6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页。

④ 参见《资本论》(纪念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页。

2. 国家价值链与中国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

国家价值链依托区际生产分工的经济学原理与全球价值链有类似和相通之处。在全球价值链中,鉴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国家间看似平等的交换,实则带来不平等的经济发展后果。大量有关不平等交换的研究都阐释了这一原理和结果(Aguiar de Medeiros 和 Trebat,2017;Kaplinsky,2019)。因而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尤其要关注其对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这也是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含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的对立统一,“如果说劳动时间表现为设定价值的活动,那么资本流通时间表现为丧失价值的时间”。^①在资本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中,存在着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对立,生产领域创造价值,流通领域实现价值,从而存在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分离关系(谢莉娟、王晓东,2021)。即便在竞争条件下,各领域的资本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参与增殖额的分配,也只是资本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实则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上,“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②“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所以,交换只是变成一种形式”。^③“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④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上述不平等则更加突出:表面看,全球生产网络日趋分散,而实际上是资本借助信息技术网络和对研发、流通的集中掌握,加强了对全球生产链条的潜在控制(谢富胜、黄盛,2015)。

国家价值链的原理有类似之处,在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只要允许资本发挥力量,就存在有支配能力并获取超额利润的“链主”区域或企业,再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强,在国内市场上不能完全排除其引致区域间不平等效应的潜在风险。而唯有能够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⑤,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才真正契合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因而要对这一问题倍加关注。

3. 国家价值链与国际价值生产体系的关系

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并非意味着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脱钩或替代全球价值链,而是建立在彼此互相促进的基础上。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断寻求攀升是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家价值链体系更看重内需导向和以本国企业作为价值链主导者,但不可能排斥世界市场,也几乎不能脱离全球生产链条。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进行本质批判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历史作用的二重性。一方面,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相互促进的,“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⑥。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37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2 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9 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1 页。

⑤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67 页。

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对于发展生产力和加速新社会变革具有长远意义,“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①,“加速了社会革命”^②,也只有在生产力普遍发展以及世界市场扩大到足够高的水平时,才会“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③。

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同样要以开放经济为前提,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是共生关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主导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作具有不平等效应,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才更应积极参与,为世界自由贸易新秩序注入中国力量和贡献中国方案(杨圣明、王茜,2018;裴长洪、刘斌,2020)。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④,“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⑤。

(二)国家价值链影响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分析

接下来结合当代价值链分工背景,分析国家价值链影响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相关机理。

1. 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发展不平等现象

全球生产分工演进深化到价值链层面,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但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位于价值链中段的低附加值环节,一直是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下的典型特征(Meng等,2020)。与全球价值链的结论相仿,部分聚焦国家价值链的文献同样验证了价值链嵌入下收益分配的明显差异(潘文卿、李跟强,2018;余丽丽、彭水军,2019)。此外,关于价值链分工贸易下的发展不平等现象,在就业和收入、环境污染等方面均得到了相关证据的支持(盛斌、马涛,2008;Wang等,2021)。既有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其成因,涉及价值链分工地位、要素禀赋、增值能力等视角(蒋为、黄玖立,2014;刘胜等,2016;余丽丽、彭水军,2022),而不同细分类型的国家价值链也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黎峰,2018)。

事实上,当前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论是推进国内区域间分工贸易往来深化,还是协调国内区域间发展的总体方向,都应注意“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习近平,2019)。基于本国市场需求所构建的国家价值链是否能够适应各地区客观经济规律、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与高效集聚,以推进地区间产业高质量联动发展与合作互助,才是决定地区间能否更平衡发展的关键。

2. 国家价值链影响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机制

虽然“复合型”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均强调充分利用本国市场分工优势和内需潜力,但不同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的各环节均限于本国市场,“复合型”国家价值链旨在通过更多释放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资源禀赋开展价值链分工贸易活动,二者在推进提升主导地位、强化产业关联、促进技术升级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可能产生对于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2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9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④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1页。

⑤ 参见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

第一,主导地位效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早期阶段,中国主要是以“被整合者”的身份融入,具有被动式的典型特征。在以东部地区为主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下,一定程度上使中西部地区成为简单生产要素的供应地,限制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空间,并形成“发达国家—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双重嵌套的“中心—外围”格局(张少军、刘志彪,2013),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现阶段中国已经具备庞大的内需基础与较高水平的供给能力,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成为新的比较优势,拥有足够的韧性与回旋空间来培育内循环,增强主导权。而“复合型”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正是强调发挥本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主动利用他国资源禀赋服务本国市场需求开展产品内分工贸易活动,释放本国市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并从生产分工的层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被动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所可能面临的“资本的本性”主导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桎梏,而且也有益于减轻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向外流失、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推进国内经济平衡发展。而“单一型”国家价值链由于从原材料投入、生产过程到最终消费的全程完全根植于国内市场,这种情况下的参与主体通常包含更多的中小企业,主导力量不够突出(陈佳贵、王钦,2005),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地区间经济资源争夺与转移现象,阻碍地区间的良性互动发展,拉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第二,产业关联效应。合理的国家价值链应依据各地区比较优势决定分工环节的空间布局,通过促进因地制宜的地区间产业互动关联,实现国内经济更平衡地发展。“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基于庞大的内需潜力推动国内国际市场的积极联通,有益于国内各地区培育并深化适应区域发展所需的生产分工链条,提升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竞争力(凌永辉、刘志彪,2020)。“复合型”国家价值链通过主动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将部分本国市场生产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要素资源交由国际市场生产进口,为各地区拓展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与互动空间;另一方面,依托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可以推动国内地区间形成以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为纽带的产业关联,进而高水平开放中实现“东西互济、内外联动”的良性循环,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不同于“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单一型”国家价值链可以看作是国内市场的一种内在循环体系,由于价值链上各环节分工地位与贸易利得不同的客观事实,以及地区间资源、技术特别是资本发达程度的固有差距,即使价值链上部分生产环节本国市场并不具备比较优势,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仍然可能出于追求短期利益的目标从发达地区承接低端产业的落后产能,从而“拖累”地方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并更易于在国内地区间形成不平等效应,不利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

第三,技术升级效应。国家价值链还可能通过促进技术升级推动经济平衡发展。“复合型”国家价值链通过主动对接国际市场,一方面,为本国市场适当引入外部竞争,可能“倒逼”国内各地区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积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激发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在与世界市场的动态竞争中实现价值链条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基于庞大国内市场需求虹吸国际市场优质要素资源,可能推进国内各地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更高质量发展。此外,依托“复合型”国家价值链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发展,也为国内各地区实现融通互补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必要空间,国内地区间将更易于形成适应区域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布局与异质化生产要素聚集,进而助益价值链特定分工环节的竞争力与技术水平提升,表现出对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应注意,在以中小企业为参与主体的“单一型”国家价值链中,可能难以通过技术升级效应促进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由于关键资源缺乏、市场竞争力有限等原因,在“单一型”国家价值链中可能出现高度同质化的“扎堆式”产业生态,地区间难以通过高效的分工生产与贸易往来推进技术

升级,部分欠发达地区也难以享受技术溢出而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从而可能拉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3. 基于国内外现实情境的拓展分析

第一,考虑国内信息化情境。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为其整合全球价值链、加强对国际分工网络的集中控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江小涓、孟丽君,2021)。这一条件对于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也同样重要,柔性生产、虚拟组织、生产工序的模块化切割以及大规模空间分离和跨区域合作等,都有赖于信息技术的支撑。现阶段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更应重视信息技术在提升价值链上核心环节竞争力与现代化水平中的关键作用(王一鸣,2020),以实现国家价值链构建助力增强内循环主体地位、提高外循环赋能质量的战略发展目标。然而,在中国加速推进并不断追赶世界领先水平的信息化发展背景下,国内市场各地区之间也存在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值得关注的是,地区之间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会对国家价值链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吗?这也是本文在国内市场的分析情境中基于信息化水平的异质性展开拓展分析的主要思考。

第二,考虑全球价值链情境。结合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实背景,东部地区凭借生产性服务业发达、成本低廉的优势,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并受益于先进技术与知识资本的溢出,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同也拉大了经济发展差距(张少军、刘志彪,2013)。此外,在以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具有附加值低、核心技术缺失的特点,中西部地区的廉价生产要素不断流向东部地区,进一步挤压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空间,打乱了中国各地区原有的产业演进与分工布局的发展路径(刘志彪,2013)。相比较而言,国家价值链通过改善区际产业配置结构、提升本地产业发展水平等,可能有益于减轻全球价值链的不平衡参与对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邵朝对、苏丹妮,2019)。并且,优先参与立足本国市场的国家价值链的企业,在随后参与全球价值链时,将呈现更突出的链条升级能力(Schmitz,2004),有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力。因此,本文将在拓展分析中考虑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效应的交互作用。

三、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接下来,本文将定量测度“复合型”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并检验其对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本文将本土企业利用国内生产资料开展分工合作,所有环节均在国内市场完成的价值链分工模式称为“单一型”国家价值链;而将基于本国市场需求,主要生产环节由本土企业承担,但在生产过程中涉及原材料及中间品进口的价值链分工模式称为“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复合型”与“单一型”的国家价值链,均是立足于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需战略基点所做出的概念界定,强调基于本国市场需求、推动地区间分工贸易往来深化,为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拓宽了发展空间;相较而言,“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可进一步启发如何以国内价值生产体系与国际价值生产体系的对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两类国家价值链对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PScore_{i,m,t} = \beta_0 + \beta_1 PGNT_{i,m,t} + \beta_2 PNT_{i,m,t} + \gamma_n controls_{i,m,t} + D_i + D_m + D_t + \varepsilon_{i,m,t} \quad (1)$$

其中, $PScore$ 代表被解释变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PGNT$ 、 PNT 分别代表解释变量地区间“复合型”与“单一型”的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 $controls$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D_i 、 D_m 和 D_t 分别代表配对地区 i 与地区 m 的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m,t}$ 表示随机扰动项, 下标 i 、 m 和 t 分别代表配对地区 i 、地区 m 和年份。

(二) 变量测度

1. 解释变量

本文在借鉴 Wang 等(2013)、盛斌等(2020)的研究思路构建区域增加值分解框架的基础上, 参照 Ng(2010)、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的做法, 构建地区 i 与地区 m 间的“复合型”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PGNT_{im}$)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PNT_{im})^①:

$$PGNT_{im} = \frac{\text{地区 } i \text{ 国内流出中的地区 } m \text{ 进口增加值} + \text{地区 } m \text{ 国内流出中的地区 } i \text{ 进口增加值}}{\text{地区 } i \text{ 总流出} + \text{地区 } m \text{ 总流出}} \quad (2)$$

$$PNT_{im} = \frac{\text{地区 } i \text{ 国内流出中的地区 } m \text{ 增加值} + \text{地区 } m \text{ 国内流出中的地区 } i \text{ 增加值}}{\text{地区 } i \text{ 总流出} + \text{地区 } m \text{ 总流出}} \quad (3)$$

此外, 定义地区 i 与地区 m 间的国家价值链整体贸易强度($PNVCT_{im}$)为两地区间的“复合型”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之和。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来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 区域协调发展应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基本目标。结合数据可得性, 本文从经济增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科技研发 5 个方面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并选取了 15 个二级指标, 其中经济增长分别从资本深化、金融发展、发展水平、增长速度 4 个维度进行评价; 公共服务分别从教育、医疗、文化角度切入; 基础设施则着眼于公路、铁路、航空, 以及互联网; 生活水平主要关注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 科技研发则从科研投入与产出两方面进行评价。进而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对应年份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 并以配对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之差的绝对值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PScore$)。^②

3.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研究的提示(丁宁等, 2013; 傅元海等, 2016; 陈启斐、巫强, 2018), 本文还控制了可能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其他因素, 包括: (1) 政府干预差异($PGovern$), 使用公共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差的绝对值表示; (2) 要素流动差异($PMobility$), 使用各省份货运量差的绝对值表示; (3) 产业结构差异($PStructure$), 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差的绝对值表示; (4) 城市化率差异($PUrban$), 使用滞后一期地区人口出生率差的绝对值表示; (5) 劳动生产率差异($PEffi$), 使用劳均增加值差的绝对值来表示。

4.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时间段覆盖 2007 年、2010 年、2012 年与 2015 年。其中, 用于解释变量测算的数据

① 篇幅所限, 完整的区域增加值分解框架构建说明未在文中展示, 留存备案。

② 篇幅所限, 正文中未展示具体指标选择和计算过程, 留存备案。

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西藏)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① 被解释变量与相关控制变量测算所需的地区层面经济、人口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价格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公报。

四、基准回归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1 汇报了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平均影响效果,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与地区固定效应,其中第(2)、(4)列进一步引入了相关控制变量。

第(1)、(2)列反映了国家价值链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的产生可能正是由于不同类型的国家价值链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由此反映在整体层面上作用的不显著。第(3)、(4)列进一步区分了“复合型”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考察国家价值链的不同类型对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复合型”与“单一型”的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的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存在对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异质性影响。这一结论提示,立足本国市场需求推进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深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平等效应的“消失”,要发挥国家价值链对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正面作用,应突出以“复合型”为主的国家价值链构建,在建设国内经济循环的同时,发挥强大内需潜力的竞争优势虹吸国际市场优质资源。^②

表 1 基准回归:国家价值链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变量	(1)	(2)	(3)	(4)
<i>PNVCT</i>	-0.1583 (0.1351)	-0.0872 (0.1322)		
<i>PGNT</i>			-2.6163 *** (0.5401)	-2.3584 *** (0.4952)
<i>PNT</i>			0.5854 *** (0.1571)	0.6001 *** (0.1510)
<i>PGovern</i>		0.1017 *** (0.0247)		0.1018 *** (0.0247)
<i>PMobility</i>		-0.0037 (0.0026)		-0.0037 (0.0027)

① 2007 年、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分别来自刘卫东等 2012 年、2014 年和 2018 年编制的《中国 2007 年 30 省市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编制理论与实践》和《2010 年中国 30 省市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2012 年中国 31 省市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2015 年数据来自中国碳排放数据库编制的“2015 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2016 年版本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主要用于拆分计算通过进口回流的增加值。

② 与既有研究观点相近,本文研究发现同样支持了在新发展格局下,应重视发挥强大内需竞争优势引致国际市场优质要素资源的作用(刘志彪,2020)。

续表 1

变量	(1)	(2)	(3)	(4)
<i>PStructure</i>		- 0. 2368 *** (0. 0347)		- 0. 2368 *** (0. 0347)
<i>PUrban</i>		0. 0013 (0. 0008)		0. 0013 (0. 0008)
<i>PEffi</i>		0. 0130 ** (0. 0065)		0. 0129 ** (0. 0065)
常数项	0. 1650 *** (0. 0012)	0. 1660 *** (0. 0048)	0. 1650 *** (0. 0012)	0. 1650 *** (0. 0049)
<i>N</i>	3480	3480	3480	3480
<i>R</i> ²	0. 0139	0. 0286	0. 1421	0. 1443

注：(1)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2) 估计系数下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3) 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①

为控制可能的潜在遗漏变量,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此外,本文还通过替换变量测试方式展开稳健性检验,包括分别替换使用配对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比率以及配对地区间生产总值之差作为被解释变量(郑江淮、戴玮,2021)、使用配对地区的国内流出之和作为分母对地区间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进行替换测度。上述回归结论均稳健。

考虑到双向因果关系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结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借鉴相关研究(倪红福等,2016;邵朝对、苏丹妮,2019),本文构建配对地区间官员籍贯联系与生产分工阶段数作为工具变量。^② 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并且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的情况下,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三) 进一步分析

进一步地,本文进行了作用机制检验。表 2 第(1)~(3)列分别展示了国家价值链对配对地区间主导地位、产业关联、技术升级的影响。^③ 回归结果显示,“复合型”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将有益于地区间在主导地位、产业关联、技术升级方面

① 本文还采用替换估计方法与消除潜在异常值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同样支持了基准回归结论。限于篇幅,所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结果都未在正文展示,留存备索。

② 篇幅所限,针对工具变量的具体构建思路以及外生性检验说明未在文中展示,留存备索。

③ 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分工格局优化,实现本国企业在价值链上主导地位的提升,可能有益于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改善(蒋为、黄玖立,2014),因此本文选择劳动收入份额作为主导地位的代理变量。考虑到产业关联效应通过优化地区间生产联系,可能有益于地区间贸易往来水平与市场整合程度的提升,本文选择市场一体化作为产业关联的代理变量。此外,一国的技术结构实际上内生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等,1994),基于价值链分工深化所形成的地区间不同生产环节的差异化布局,若遵循比较优势可能有利于技术升级。有鉴于此,本文选择比较优势作为技术升级的代理变量。本文的机制变量为配对地区间相应变量差的绝对值的负数。

的协调发展。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主导地位、产业关联与技术升级是“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助益地区间经济更平衡发展的潜在作用途径。^①

表 2 进一步分析:国家价值链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机制

变量	(1)	(2)	(3)
	主导地位	产业关联	技术升级
<i>PGNT</i>	3. 9892 ** (1. 6751)	0. 1213 ** (0. 0571)	28. 4291 *** (3. 6810)
<i>PNT</i>	-0. 5693 (0. 5642)	-0. 1001 *** (0. 0192)	-6. 9082 *** (1. 2472)
常数项	0. 1561 *** (0. 0334)	-0. 0252 * (0. 0151)	-0. 9722 *** (0. 0752)
<i>N</i>	3480	3480	3480
<i>R</i> ²	0. 8671	0. 2891	0. 60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五、异质性检验与拓展情境分析

(一)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中国各经济区域之间在自然资源、工业基础、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这种差距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本文进一步区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样本,检验国家价值链的作用发挥是否存在不同。^②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单一型”国家价值链表现出拉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显著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较之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单一型”国家价值链以替代型为主的贸易合作特征更为突出,因此伴随“单一型”国家价值链的深化,地区间资源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问题更加严峻,从而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不利于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特征。这一结果提示,在立足国内市场强大内需潜力推进区域间分工贸易合作深入至价值链层面的同时,应注意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竞争优势与资源禀赋存在的客观差异,深化区域间国家价值链的互补性与协同性,因地制宜地拓展区域发展空间,实现经济更平衡地发展。

表 3 异质性检验:不同经济区域下的国家价值链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变量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i>PGNT</i>	-2. 3350 *** (0. 8171)	-2. 1061 *** (0. 7423)	-2. 4704 *** (0. 7941)	-2. 1533 *** (0. 6761)

① 虽然本文未直接检验主导地位、产业关联、技术升级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但主导地位、产业关联、技术升级在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已在既有研究中得到相关论证(张少军、刘志彪,2013;黎峰,2018;余丽丽、彭水军,2022)。

②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续表 3

变量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i>PNT</i>	0.3573 (0.2724)	0.4041 (0.2531)	0.9443 *** (0.2012)	0.9374 *** (0.1982)
常数项	0.2610 *** (0.0042)	0.2771 *** (0.0171)	0.1223 *** (0.0024)	0.1130 *** (0.0063)
<i>N</i>	1276	1276	2204	2204
<i>R</i> ²	0.0660	0.2151	0.0411	0.1292
Chow Test	<i>PGNT</i> (2) - (4):0.00; <i>PNT</i> (2) - (4):2.77 *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注:Chow Test 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单一型”国家价值链估计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二)拓展情境分析

本部分将分别引入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异质性与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度的异质性作为考虑国内外现实情境的拓展分析。

1. 国内情境:信息化发展水平异质性与国家价值链的作用发挥

借助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编制的信息化发展指数,本文通过计算配对地区间的信息化总水平评价指标,以及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应用消费、知识支撑、发展效果 5 个信息化细分评价指标之差的绝对值的负数以衡量地区间信息化发展水平相似性。表 4 展示了回归结果。不论是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还是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应用消费、发展效果 4 个信息化发展细分维度水平的均衡提升,均将“直接”促进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这一发现支持了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对于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仅有发展效果这一信息化发展细分维度水平的均衡提升,将显著促进“复合型”国家价值链的正面作用发挥,并且纠偏“单一型”国家价值链的负面作用,从而“间接”拉动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发展效果反映了信息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以及全社会在信息化方面投入和产出的综合情况。因此,要真正发挥信息化发展对于国家价值链积极效果的“放大镜”作用,应更关注创造适应于信息化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表 4 国内情境:信息化发展水平异质性与国家价值链的作用发挥

变量	(1)	(2)	(3)	(4)	(5)	(6)
<i>PGNT</i>	-0.0081 *** (0.0023)	-0.0091 *** (0.0023)	-0.0104 *** (0.0021)	-0.0100 *** (0.0021)	-0.0083 *** (0.0021)	-0.0102 *** (0.0023)
<i>PNT</i>	0.0051 ** (0.0024)	0.0064 *** (0.0021)	0.0073 *** (0.0024)	0.0063 *** (0.0023)	0.0063 *** (0.0012)	0.0073 *** (0.0021)
<i>Z</i>	-0.0860 *** (0.0071)	-0.0113 *** (0.0040)	-0.0173 *** (0.0021)	-0.0062 *** (0.0020)	0.0011 (0.0024)	-0.0142 *** (0.0030)
<i>PGNT</i> × <i>Z</i>	0.0032 (0.0021)	-0.0010 (0.0024)	-0.0033 (0.0020)	-0.0014 (0.0023)	-0.0012 (0.0023)	-0.0034 *** (0.0011)

续表 4

变量	(1)	(2)	(3)	(4)	(5)	(6)
$PNT \times Z$	-0.0033 (0.0020)	-0.0023 (0.0031)	-0.0021 (0.0020)	-0.0010 (0.0024)	0.0033 * (0.0020)	-0.0033 * (0.0020)
常数项	0.1701 *** (0.0051)	0.1652 *** (0.0061)	0.1680 *** (0.0052)	0.1631 *** (0.0063)	0.1642 *** (0.0061)	0.1653 *** (0.0052)
N	2610	2610	2610	2610	2610	2610
R^2	0.2817	0.1493	0.1922	0.1514	0.1481	0.16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1)交互项涉及的变量数据均已进行中心化处理,下同;(2)第(1)~(6)列的变量 Z 分别为信息化总指数、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技术指数、应用消费指数、知识支撑指数、发展效果指数;(3)由于信息化发展指数2015年的数据不可得,因此国内情境部分的分析仅覆盖2007年、2010年、2012年。

2. 国际情境: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度异质性与国家价值链的作用发挥

本文通过计算配对地区间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度差的绝对值表示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度异质性(PGT)。^①表5展示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区间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不均将拉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度异质性后,国家价值链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即有益于促进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为“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值得注意的是,“复合型”国家价值链贸易强度与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度异质性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复合型”国家价值链有益于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积极作用还间接地表现为,减轻由全球价值链参与不均所引致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表 5 国际情境: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度异质性与国家价值链的作用发挥

变量	(1)	(2)	(3)
PGT	0.0431 *** (0.0062)	0.0633 *** (0.0132)	0.0523 *** (0.0131)
$PGNT$	-2.7033 *** (0.5161)	-0.7350 * (0.3871)	-2.6594 *** (0.6233)
$PGNT \times PGT$		-6.2453 ** (2.9761)	-1.8904 * (1.0931)
PNT	0.6601 *** (0.1492)		0.7764 *** (0.1683)
$PNT \times PGT$			0.1714 (4.0064)
常数项	0.1663 *** (0.0063)	0.1653 *** (0.0063)	0.1663 *** (0.0061)

① 本文通过计算各地区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占总流出的比重反映各地区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度。具体测度说明留存备索。

续表 5

变量	(1)	(2)	(3)
N	3480	3480	3480
R^2	0. 1532	0. 1452	0. 15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六、结论与启示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了构建中国国家价值链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了其对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立足强大的国内市场,推动国家价值链构建是战略必然之选,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唯有助力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国家价值链,才真正契合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同时也要注意协调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共生发展关系。第二,实证检验发现,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不仅能抑制全球价值链嵌入“鸿沟”带来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而且对国内经济实现更平衡发展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相较于“单一型”国家价值链,只有在国内外市场联动基础上的“复合型”国家价值链,才发挥了上述作用,意味着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应以高水平开放为前提。第三,进一步的拓展分析结果表明,在构建国家价值链的进程中,要促进信息化发展的地区间平衡,尤其应重视推进支撑信息化发展的宏观环境因素的均衡改善,其不仅本身有益于地区间经济的更平衡发展,而且同时作为“放大镜”,能促进国家价值链对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正向作用的释放。

上述结论为在新发展格局下构建中国国家价值链、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具体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应重视国内外市场联动的“复合型”国家价值链建设,以推动国内经济更平衡地发展。以国内市场为主导构建国家价值链,并不意味着也并不能够割裂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摒弃全球价值链或与其脱钩。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并不是对立的观念,正确的思路应是在满足日益升级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需求的过程中,通过加强地区间资源整合、发挥区位优势,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并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融合,实现与世界市场主动广泛的交流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进一步发挥国内外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拓宽国内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空间,提升国际竞争力,以此加强国家价值链建设,促进国内经济更平衡发展,并“纠偏”全球价值链的不平等效应。

第二,继续加强信息化建设,缩小区域“数字鸿沟”,促进国家价值链对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好显现。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国家价值链在经济平衡发展中的正向作用,不仅应着力实现地区间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应用水平的均衡提升,更要培育支撑信息化发展的宏观环境,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科技支持水平,从顶层设计角度系统规划有益均衡发展的信息化发展环境,为国家价值链切实发挥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识别国家价值链的异质性作用,谨防价值链分工深化本身所造成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应注意在中国国内各区域间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存在明显差异的客观背景下,可能带来由于国家价值链在促进各区域平衡发展中的收敛速度不一致,所导致的潜在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因此,不应仅着眼于整体平均意义上的国家价值链对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未来应

充分发挥国家价值链促进区域增长极带动经济腹地共同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深化国家价值链的进程中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佳贵、王钦:《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9期。
2. 陈启斐、蔡璐:《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年第11期。
3. 陈启斐、巫强:《国内价值链、双重外包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自长江经济带的证据》,《财贸经济》2018年第7期。
4. 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5. 崔向阳、崇燕:《马克思的价值链分工思想与我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经济学家》2014年第12期。
6. 崔向阳、袁露梦、钱书法:《区域经济发展: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的不同效应》,《经济学家》2018年第1期。
7. 丁宁、周经、丁华:《流通创新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7期。
8. 丁涛:《全球价值链的霸权性质——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9. 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10. 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11. 蒋为、黄玖立:《国际生产分割、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4年第5期。
12. 黎峰:《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基于改进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3期。
13. 黎峰:《进口贸易、本土关联与国内价值链重塑》,《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9期。
14. 黎峰:《国内专业化分工是否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2期。
15. 林毅夫、蔡昉、李周:《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16. 凌永辉、刘志彪:《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17. 刘胜、顾乃华、陈秀英:《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16年第3期。
18. 刘志彪:《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9. 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20. 刘志彪、张少军:《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
21. 倪红福、龚六堂、夏杰长:《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管理世界》2016年第4期。
22. 潘文卿、李跟强:《中国区域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23. 裴长洪、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24. 邵朝对、苏丹妮:《国内价值链与技术差距——来自中国省际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6期。
25. 沈剑飞:《流通活动、市场分割与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财贸经济》2018年第9期。
26. 盛斌、马涛:《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基于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
27. 盛斌、苏丹妮、邵朝对:《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经济增长:替代还是互补》,《世界经济》2020年第4期。
28.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29. 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
30. 谢富胜、黄盛:《全球生产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8期。
31. 谢莉娟、王晓东:《马克思的流通经济理论及其中国化启示》,《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
32. 谢莉娟、陈锦然、王晓东:《中国国家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33. 杨圣明、王茜:《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兼论“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
34. 余丽丽、彭水军:《国内增加值率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
35. 余丽丽、彭水军:《全面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价值链互动视角》,《世界经济》2022年第1期。
36. 张少军、刘志彪:《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经济管理》2013年第8期。
37. 郑江淮、戴玮:《中国技术空间雁行式变迁缩小了地区经济差异吗——基于地区间技术邻近度的假说和实证》,《财贸经济》2021年第12期。
38. Aguiar de Medeiros, C., & Trebat, N., Inequal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51, No. 2, 2017, pp. 401 – 408.

39. Beverelli, C., Stolzenburg, V., Koopman, R. B., & Neumueller, S., Domestic Value Chains as Stepping Stones to Global Value Chain Integration. *The World Economy*, Vol. 42, No. 5, 2019, pp. 1467 – 1494.

40. Kaplinsky, R., Rents and Inequality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 Ponte, S., Gereffi, G., & Raj-Reichert, G. (eds.), *Handbook on Global Value Chains*.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pp. 153 – 168.

41. Meng, B., Ye, M., & Wei, S. J., Measuring Smile Curv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2, No. 5, 2020, pp. 988 – 1016.

42. Ng, E. C.,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Business-cycle Comov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2, No. 1, 2010, pp. 1 – 14.

43. Schmitz, H.,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 Recent Findings*.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4.

44. Wang, Z., Wei, S. J., & Zhu, K. F.,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677, 2013.

45. Wang, S., He, Y., & Song, M., Global Value Chain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equality Towa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 277, 2021, 110999.

National Value Chain and China's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XIE Liju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CHEN Jinra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00070)

Abstract: As China moves faster to constru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t is of more prominent significance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huge domestic market and build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Combining theori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the real-life demand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c inevitability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which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its role in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y, and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 terms of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can alleviate the imbalance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used by imbalanced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type” national value chain based on the domestic market on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omposite type” based both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can promote the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y, by improving the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strengthening inter-industry connection, an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 addition,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will serve as a complementary condition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y. This paper provides useful ideas for how to build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Keywords: National Value Chai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High-Level Openness, Informatization

JEL: R12, R15, O18

责任编辑: 静 好